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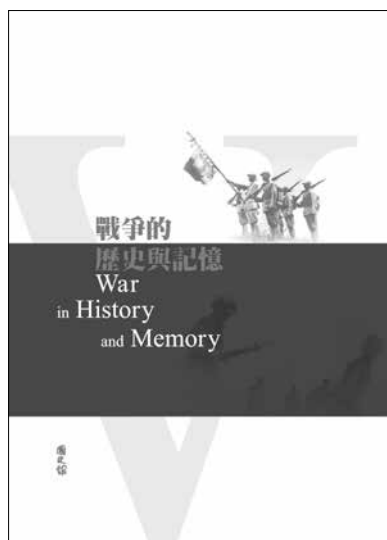
《戰爭的歷史與
記憶》簡介

書訊

抗日戰爭是一個關係當時中華民國國家存亡、形塑後來國家發展、影響現今國際局勢的決定性戰爭，至今仍有許多國家和個人受其影響。抗戰距今已逾七十載，已有足夠的時間縱深去進行歷史反思，又由於近年來史料大量開放，學術研究充分自由，研究成果日益豐碩，因此重新檢視抗戰的歷史意義、重寫抗戰史，成為學界共識。

今（2015）年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週年，也是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國史館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立故宮博物院等單位，於7月7日至9日在臺北共同主辦「戰爭的歷史與記憶：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邀請國內及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波蘭、日本、韓國、印度、澳洲、中國大陸、香港等地的知名學者參加。會中發表50餘篇論文，從軍事、經濟、社會、文化、民族、性別、人物、思想、國家建構、區域研究、司法正義、國際關係等多元面向，開發不同的新議題，較全面而整體地探討抗戰的歷史，重新回顧及省思抗戰的意義。

為讓國內外各界人士快速且深入地了解抗戰的歷史意義以及當今學界的研究重點和最新觀點，國史館特別從國際角度，挑選上述會議論文中的代表作品，編輯出版《戰爭的歷史與記憶》一書。



《戰爭的歷史與記憶》封面

該書概分「政治、軍事、外交研究篇」和「社會、文化、區域研究篇」，收入 16 篇中、英文論文。以下扼要介紹各篇論文的主要內容。

一、政治、軍事、外交研究篇

戰爭本身，除了一些只可歸諸「命運」的偶然因素外，就是一連串的理性抉擇，例如如何在最有利的時機和條件下決定發動戰爭或避免戰爭、擴大戰爭或縮小戰爭、持續戰爭或結束戰爭，且會不斷地因人、因事、因時、因勢而改變。再者，中日進行的是一場總體戰，除了軍事之外，還全面總動員，由於雙方有形戰力懸殊，中國所能發展

及運用的無形戰力就變得至關緊要，包括精神與決心的比拼、政治和外交的運作等，都發揮了關鍵作用。尤有進者，抗日戰爭是二戰的一部分，近年來各國各界已越來越能體認抗戰在二戰及戰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與歷史定位，以世界史視角來考察戰時的政治與外交，就會理解抗戰不僅對中國在當時及戰後乃至今日帶來重大影響，也對戰後的國際局勢產生深遠影響。

張玉法〈戰後中國的新局與困局〉：是會議的專題演講，宏觀地闡釋戰後中國的新局與困局，而無論新局或困局都是在抗戰期間開創或造成的。所謂新局主要是指中國國際地位的大幅提升，有機會收回被日本所占的領土，並躍居世界五強之一，躋身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在東亞所承擔的國際責任亦較前為重。所謂困局主要是指戰後在美、蘇對抗的國際局勢中，美國續持重歐輕亞政策、忽視戰時重要盟友中國，而抗戰期間積極在敵後發展勢力的中共已經壯大，在蘇聯支持下與國民黨爭奪政權，使國家再陷戰火，喪失早日復興的機會。

王奇生〈抗戰初期的「和」聲〉：抗戰初期的和戰抉擇甚為艱難，考驗決策者的戰略、政略眼光和毅力，也是影響往後戰局發展的關鍵。作者參考諸多日記、書信等私密性史料，指出戰時公開言論雖是一面倒地主戰，但在私下場合，悲觀與主和似乎更具普遍性，而蔣介石仍有「眾人皆和，我獨戰」的堅持。過去的研究多聚焦主戰派與主和派

代表的蔣介石和汪兆銘，而忽視整個和、戰大局以及更大群人的主張。本文廣泛考察政治精英在戰爭過程中的心態演變，同時也兼及少數與政界關係密切的學界精英的態度取向，為抗戰初期知識分子的和戰抉擇提供一個大的思想背景。

傅應川〈抗戰期間共軍的發展策略及其戰略影響〉：從發展策略來看中共參加抗戰的始末以及共軍在抗戰期間的擴展，並對中共對抗戰的影響有正負兼具的評價。作者認為中共軍力的壯大，取決於其發展策略和共產國際的指導，而日本侵華給予中共絕佳的發展機會。中共的發展策略為：以擴張實力應付國民政府為主，以游擊戰術避免與日軍直接衝突，並進行其獨立自主的發展，而最終目的在消滅包括蔣介石領導的中央軍及日軍在內的一切所謂的反動勢力。

楊天石〈再論龍雲和汪精衛出逃事件：兼述龍雲的謊言與兩面行為〉：對抗戰期間龍雲與汪兆銘個人來往、蔣介石對汪政權的態度與做法、以及中央與西南的整體關係，做了仔細的梳理。認為龍雲一方面暗通汪，一方面又敷衍蔣；蔣介石則對龍一方面拉攏，一方面防範；戰時蔣與龍始終進行著控制和反控制的鬥爭。

岩谷將〈日本陸軍眼中的汪精衛和平運動〉：依據日本陸軍、外務省及中日雙方參與其事者的私人檔案等史料，透過對日本陸軍對華政策的分析來理解汪精衛的和平運動，並勾勒出自 1938 年 1 月日本政府發表

聲明「不以國民政府為為對手」而結束同蔣介石政權的交涉起，到宣布承認汪精衛政權為止這段期間，日本陸軍對華和平工作的全貌。

林孝庭〈開羅會議再思考〉：耙梳蔣介石日記和其他相關史料，包括中、美、英三方的政府檔案、三國領袖及其幕僚的個人檔案等，重新思考過去討論開羅會議時被忽略的一些問題，如蔣介石究竟如何看待這次會議？他對受邀參加會議的最初反應為何？他和幕僚打算採取什麼策略、準備提出哪些議題、其優先順序又是如何？為何此一峰會最後會演變成中、美關係乃至中國與盟國關係由盛轉衰的分水嶺？

William C. Kirby, “China Stands Up: The Wartime Foundations of China’s Emergence as A Great Power”（中國站起來：抗戰時期中國所打下的強國基礎）：是會議的 keynote speech，以宏觀的角度敘述抗戰對中國在當時及戰後乃至今日所帶來的重大影響。首先說明戰爭在經濟上、心理上所帶來的重大影響，其次舉出中國能長期抗戰並贏得最後勝利的前提有三：蔣介石的決心與領導、透過成功的外交運作與美蘇德三大強權合作或結盟、戰時經濟體系的有效動員；最後闡釋抗戰勝利對戰後以迄現海峽兩岸發展的影響，指出勝利是今日中國崛起成為世界強國的先決條件，中國在戰時已逐步奠立強國基礎；並強調中國「站起來」的時間並非在 1949 年，而是更早的 1945 年，

當時中華民國已展現領導東亞、擊劃戰後國際新秩序的世界大國強者姿態。

Hans van de Ven, “The Turning Point: Japan’s Operation Ichigo and Its Consequences” (對日抗戰轉捩點：日本一號作戰及其影響)：本文分兩大部分，一是從軍事角度檢視一號作戰的作戰經過及成效；二是分析一號作戰對於戰時和戰後的中國及國際局勢的影響。作者認為一號作戰雖無助於改善日本當時的戰況，但對戰後中國和東亞的影響就像同一年諾曼第登陸作戰對歐洲的影響同樣深遠，是中共在國共長期衝突過程中開始掌握勝算的轉捩點。一號作戰改變了國民政府與美國的關係，共產黨趁機迅速擴張，從而奠定戰後打贏內戰的基礎。抗戰末期的發展對戰時及戰後的中國甚至國際局勢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過去研究較少，但未來勢將成為二戰史的一個研究重點，本文則甚具奠基作用。

Rana Mitter,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of Asian Order and the Legac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East Asia” (戰後亞洲秩序的重建與抗戰遺留給當代東亞的問題)：探討戰後亞洲秩序的重建、地緣政治的形塑，以及抗戰遺留給當代東亞的一些問題，並說明這些戰爭遺留下來的「未竟事務」是如何持續困擾著亞洲，而歐洲卻能擺脫其束縛。二戰所遺問題導致冷戰時期超級大國間的衝突，戰時的反帝國主義及民族解放論述在戰後繼續衍生成亞非的一些結盟，

而中國在 21 世紀的崛起，對東亞、東南亞及南亞的區域政治產生關鍵影響。二戰雖然離今愈遠，但其政治影響卻不減反增。

二、社會、文化、區域研究篇

戰爭的影響通常不止於軍事和政治，往往擴及社會與文化等層面，因此各個面向的分析、比較與討論，是研究戰爭史的重要取徑。另外，探討戰爭與人的關係，以及從庶民角度、個人觀點來檢視或反映由戰爭所形塑的時空結構和時代氛圍，都是在近年戰爭史研究中備受關注的一環。再者，對戰爭樣貌與經歷的重新描述，對戰爭記憶的重新反思，以及對戰爭價值的重新衡量，也都是學界愈來愈重視的問題。這些新領域的研究成果，展現出戰爭多元的樣貌，也細膩刻劃出戰爭對人與社會的影響。

葉文心〈重慶、上海與浙南：文本視角的戰時中國〉，近年來許多有關抗戰的研究已經超越了泛政治化的詮釋，而重視對戰爭樣貌與經歷的描述，並與歐戰做關聯性和比較性的探討。作者以此新視角重新思考抗日戰爭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文化意義。本文選擇三個在戰時的重慶、上海及浙南山區寫成的文本，將其內涵與戰時環境相互參照，以大時代中所形成的各種小氛圍來反映戰爭邏輯在不同時空結構中的體現。從而指出戰爭邏輯重新分配了社會資源、重新繪製了中國的文化地圖，並闡發以下觀點：戰爭促成中

國國家與社會大規模的轉型，包括社會的軍事化與組織化，而戰後社會延續戰時的動員機制，雖然強化了國家機器的能力，但亦削減了民間社會的生機活絡。

黃英哲〈離散與跨境：論臺灣作家的「抗戰」〉：戰爭與人（無論是個人或群體）的關係的研究愈來愈受重視。作家的日記和自傳作品頗能從個體的角度反映出時代氛圍與個人心境，本文即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抗戰與臺灣，以楊基振、吳新榮及陳蕙貞等三位臺灣作家的離散與跨境為例，透過他們的日記、自傳小說等文本，探討他們在不同地理空間上的「抗戰」認知與「抗戰」意義為何？並進一步對照分析隱藏在他們心中的民族身分認同與國族主義的糾葛。

藍適齊〈「被殖民者」的遭遇，「帝國」（不負）的責任〉：作者指出在戰後日本關於戰爭體驗與戰爭責任的討論中，幾乎完全忽略臺灣人因作為被殖民者而在戰時及戰後所背負的戰爭苦難。本文以戰爭前後在香港的臺灣平民的經歷為中心，參考香港本地人、日本人及臺灣人在當時與事後的個人紀錄，比對各方在認知上的異同，並由「戰爭受害者」及日本帝國「引揚者」的雙重歷史脈絡，來究明日本帝國和帝國的戰爭對臺灣人的影響。

Nicole E. Barnes，〈女性在醫療界的地位：以重慶陪都時期為探討背景〉：戰爭史研究的另一新趨勢是性別研究，抗戰時期的性別研究較為罕見，本文可作為補白。作者

利用醫院檔案、教會檔案，以陪都時期重慶公共衛生活動與醫療管理體系的個案，來論證戰爭使性別角色產生許多重要改變，也是婦女就業的重要轉折關鍵，沒有婦女投入勞動力，戰時的醫療和公共衛生服務就不會有明顯的擴張；同時指出婦女雖然獲得新的就業機會，但在醫療專業上仍面臨相同的性別階層問題，證明即使到了 1930 年代戰亂動盪又充滿機會的時代，中外人士依然存在著性別偏見。

Guy S. Alitto，*“National War at the Grass Roots Level: Zouping County, Shandong”*（中國抗日戰爭中的草根階層：山東鄒平縣）：從地方史的角度來檢視抗戰，不僅向下體現了戰時地方社會的實況，也向上反映了國、共以及各種地方勢力之間錯綜複雜的長期糾葛，是抗戰史中少有的微觀式區域研究及個案研究。本文以鄒平為例，說明在抗戰的大背景下，國共衝突已然在敵後地區形成。作者不單論國共兩方的鬥爭，而是整體檢視所有地方勢力的競合，指出鄒平地方勢力的分裂和衝突，基本上就是 20 世紀初中國近代史上「軍閥時期」的縮影。本文主要資料來源是數百位當地居民的口述歷史訪談和手稿等，研究結果發現當地居民的社經地位似不影響他們的政治抉擇，一般都認為是中共領導鄉村社會較貧窮的一方起來革命對抗較富裕的一方，而鄒平的情況卻是反證。本文直接以當事人的實際身分與行為當作分析依據，超越了國或共代表哪一階層或群

眾的刻板表相。

Antonia Finnane、John Fitzgerald，*“Remembering the Massacre, Remembering Nanjing: Inclusive Nationalism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China Dream”*（永誌大屠殺，永懷南京：包容性民族主義與中國夢的挑戰）：探討戰爭的歷史記憶，一方面將1937年南京大屠殺事件置於較寬廣的時空脈絡中做階段性的整體考察，另一方面也嘗試分析歷史記憶在各個時期乃至今日，所受到的諸如國內政治、國際關係、國家民族意識和利益等非歷史因素的影響，及其所隱含的意義。本文深入討論南京大屠殺為何被記憶和遺忘、被誰記憶和遺忘、如何被記憶和遺忘、被記憶多少和遺忘多少、在何時被記憶和遺忘、在何處被記憶和遺忘？作者闡釋了上至官方、下至庶民、近至中國內部、遠至異域他邦的各種相關紀念活動和文字記載，及各種不同的經驗、認知、觀點甚至意識形態等，嘗試建立中國以及海外對南京大屠殺的記憶和遺忘的一些基本模式，並將之與所謂的「包容性民族主義」與「中國夢」連起來看。

Christian Henriot，*“August 1937: War and the Death en masse of Civilians”*（1937

年8月：戰爭與平民的集體死亡）：從庶民角度來看淞滬戰役時日軍三次空襲上海所造成的集體傷亡，以中外各方資料包括政府檔案、庶民史料、媒體報導、影像紀錄等為基礎，檢視造成轟炸與誤炸的種種因素、人為災難的程度、當局對突發的大量傷亡的因應和處置、身歷其境的中外人士當時的感受，及該事件如何在日後被記憶或遺忘。作者處理史家較不常碰觸的戰爭與平民傷亡問題，嘗試以還原歷史現場、重建歷史真相的方式，和以人的立場去探索戰爭暴力和戰爭記憶的問題，因此更能顯示戰爭的複雜面相及其殘酷破壞的本質。

本書採取新的視角，尤其從國際角度、人和社會的角度來看抗戰，不僅探討抗戰在戰時和國內的影響，也重視抗戰對戰後及國際的影響，包含的範疇超越了傳統軍事史、政治史、外交史的論述模式，而擴及社會、文化等層面。國際學界對戰爭研究的新視角，一定會讓抗戰的歷史意義有新的發現、新的詮釋。希望藉由本書的出版，能引發各界對抗戰史更多的關注與迴響，一起從更多元的新角度、新領域和新議題來研討抗戰的歷史真相與時代意義。